

日本儒学与 思想史研究

——王家骅先生纪念专辑

刘岳兵 主编

日本思想文化史研究

Selected Studies in Japa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日本儒学与 思想史研究

——王家骅先生纪念专辑

刘岳兵 主编

日本思想文化史研究

Selected Studies in Japa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儒学与思想史研究：王家骅先生纪念专辑 / 刘岳兵主编. --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6.9

(日本思想文化史研究)

ISBN 978-7-201-10839-1

I. ①日… II. ①刘… III. ①儒学—思想史—研究—日本 IV. ①B222.05②B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25026号

日本儒学与思想史研究——王家骅先生纪念专辑

RIBEN RUXUE YU SIXIANGSHI YANJIU — WANGJIAHUAXIANSHEGJINIANZHUANJI

出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人 黄 沛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责任编辑 岳 勇
装帧设计 汤 磊

制版印刷 天津市宏瑞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2
插 页 3
字 数 350千字
版次印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联系调换(022-23332469)

南开大学梅田善美日本文化研究基金资助出版



王家骅先生（1941-2000）



**“文明的对话与比较：以中日儒学为中心”学术讨论会
暨王家骅先生文集《中日儒学：传统与现代》出版研讨会**

主办：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深圳大学学报》“文明对话与文化比较”专栏 后援：南开大学梅田善美日本文化研究基金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日本研究中心

南開大學

2015年7月4日纪念活动合影

编者的话

以这种形式来纪念王家骅先生(1941—2000),是我始料未及的。但是,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还有什么更好的纪念方式呢?

2014年12月,我们编辑的王家骅先生的论文集《中日儒学:传统与现代》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2015年7月4日,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举办了“文明对话与比较:以中日儒学为中心”讨论会暨王家骅先生文集《中日儒学:传统与现代》出版研讨会;现在大家见到的这本《日本儒学与思想史研究——王家骅先生纪念专辑》,就是以去年的研讨会与会论文为基础编辑而成,是这次纪念活动的最后一环。这次纪念活动,得到了王家骅先生的家人、生前同事、朋友、学生以及关心和支持南开日本研究的学界同仁和国际友人的大力协助,在此深表感谢!

我在硕士研究生阶段选修过王家骅先生开设的“日本儒学史”的课,只能算是王先生“课上的学生”,而不是“入室弟子”。但是王先生是我日本研究的启蒙老师,尽管当时上课的情况没有什么印象了,而读王先生的书,为其书写“书评”,是我学习和思考日本思想文化的起点。^①后来我的日本研究之路,也是在吸取和反思王先生的日本研究的思路与方法的过程中不断展开的。我的博士学位论文

① 硕士毕业之后,各种因缘际会,我留在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当时正值1994年中心大楼落成,有幸跻身楼内,与王家骅先生研究室相邻,开始学习和思考日本思想文化的相关问题。在王家骅先生的劝诱和鼓励下,先后发表了《日本儒学及其对日本文化与现代化的影响——评王家骅的三本书》(《日本研究》1995年第4期)、《忧患之心·寂寞之道:王家骅和他的日本儒学研究“三部曲”》(《南开周报》,1995年11月22日)、《同情及其界限——重读王家骅的〈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收入徐静波、胡令远主编的《东亚文明的共振与环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这三篇文章均经王家骅先生过目并代为投到相关刊物后发表。前两篇收入拙著《中日近现代思想与儒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后者收入拙著《“中国式”日本研究的实像和虚像——重建中国日本研究相关学术传统的初步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选择日本近代儒学作为研究对象，很大程度就是受到其影响。^①2004年，即硕士毕业10年后，我几经辗转有幸又回到了南开，加入到传承和弘扬王家骅先生开创的南开日本思想文化史研究传统的队伍中来。我们在反思中国日本研究的学术传统时，王家骅先生的业绩无疑是值得认真总结的。^②一晃又过了10年，随着王家骅先生文集《中日儒学：传统与现代》的出版，也开启了纪念王家骅先生学术活动的序幕。

实际上，准备工作早就在进行了。2011—2012年，我在京都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进行合作研究期间，确切地说是2012年4月10日，我与岩波书店的马场公彦学兄联系，向他打听鹿野政直先生的联系方式。翌日我即得到回信，并获知了鹿野先生的详细地址。我冒昧地给鹿野先生去了一封信，并附上了由金井日出美先生翻译的《中国日本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③，5月15日收到了鹿野先生12日给我写的明信片。其中谈到我的文章中“将王家骅先生的业绩以敬意给予历史定位，读了非常感动”。并深有感触地说道：“王家骅先生对我们而言也是非常难以忘怀，至今痛叹其英年早逝，怀念之情有增无减。”但是具体向鹿野先生提到王家骅先生的纪念活动，是在2015年年初。

2015年1月中旬，我去早稻田大学参加一个学术讨论会，正好可以在东京停留几天。我让当时在早大留学的周晓霞事先为我联系好与鹿野先生见面的时间。1月19日下午，我和晓霞一起去拜访鹿野先生夫妇。13点从东京站乘京叶线，14点25分到御宿站，鹿野先生已经在车站出口等着我们。鹿野先生开车带我们到他家里，堀场清子夫人已经等在家门口。坐定之后，我向鹿野先生呈上刚刚出版的王家骅先生的《中日儒学：传统与现代》和《南开日研五十年（1964—2014）》等图书资料。提到王家骅先生，鹿野先生夫妇有说不尽的感慨，和我们分享了与王先生之间许多令人怀念的往事。鹿野先生拿出家骅先生的日文著作《中日儒学的比较》和1991年家骅先生在早大鹿野先生主持的夏季寄宿集训班上所做报告《西村茂树的儒学思想》的提纲。在这份提纲上，写满了红批。由此可以想象他们当时围绕这一

① 参见拙著：《日本近代儒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5、321、322页。

② 参见拙著：《“中国式”日本研究的实像和虚像——重建中国日本研究相关学术传统的初步考察》，第82—86页。

③ 刘岳兵著、金津日出美訳；「中国における日本思想史研究の方法論的問題——ある学術史的回顧と展望」、『東アジアの思想と文化』第4号（立命館大学文学部桂島宣弘研究室）、2012年3月。

问题所进行的具体而细致的交流。话题自然提到了我们准备于7月将举办的纪念王家骅先生的研讨会，我斗胆提议，请求鹿野先生为研讨会写几句话，他认真而且详细地询问了会议的主题及字数要求，愉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并表示这是十分荣幸的事。2015年2月26日收到鹿野先生2月6日写的信，充分肯定纪念集会的意义，并答应将在4月底寄来纪念文章。2015年3月23日，收到了鹿野先生3月12日的信和满怀深情的纪念文章《追慕王家骅先生》。拜读鹿野先生的追忆文章，再重读王家骅先生的《鹿野政直及其日本思想史研究》（《日本学刊》，1992年第3期）和《杂忆三则》（收入《中日儒学：传统与现代》）中的《鹿野政直先生》，我在给鹿野先生的回信中说：“如果中日关系能够像两位先生这样有相互深入的理解和彼此的敬慕，该多好！两位先生之间的深情厚谊作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我深受感动。”

2015年7月4日，纪念王家骅先生的研讨会如期举行。会议规模虽然不大，但是内容充实、形式严谨、日程紧凑，非常讲求实效。这也正是王家骅先生为人为学的风格吧。

内容充实可以从与会论文的质量、涉及的范围来看，也可以从与会者的阵营构成来看。桂岛宣弘、徐兴庆、辻本雅史三位教授的论文，分别从宏观、中观、微观不同的层面考察了前近代东亚文明圈中儒学与社会思想的关系。桂岛教授与王家骅先生曾经有比较亲密的交流关系，特别是桂岛教授提到当时得知王家骅先生的著作中曾经引用了自己论著时的那种兴奋与感激，说至今仍然难忘。辻本教授与王先生的交往情况如何我不太清楚，但是我们不仅可以从王先生的复印资料中找到辻本教授的著作《近世教育思想史之研究：日本“公教育”思想的源流》，而且我在整理王先生的遗物时，还发现一份8页纸的辻本教授讲座提纲《日本的学习文化：以贝原益轩为例》，上面有许多王先生用日语或中文做的笔记。可见，辻本教授也是王先生尊敬的学者。徐兴庆教授是中国台湾的日本思想文化研究领域标志性人物，也是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实践者。他提交的论文《有关日本德川博物馆的相关文献解释——水户藩的传统学问及其与东亚、西洋文明之关系》，利用其实地调查的珍贵文献，为我们展示了许多水户学鲜为人知的方方面面。后来才知道这篇大作是他主编的《日本德川博物馆藏品录Ⅲ 水户藩内外关系文献释解》一书的导言。而这本大作正好也在7月份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我们的会议在月初，当时尚未见到样书。令我感动的是，徐教授后来为这本纪念专辑另外新写了一篇大作，

就是收录在册的《〈大日本史〉史观与日本“水户学”的重建》。徐教授在这里提出了“中期水户学”的概念，试图解决前后期水户学的连接问题。这无疑将成为水户学研究的经典之作。不仅如此，徐教授在会议之后重新拜读了王家骅先生的著作，并且在这篇特意为纪念专辑新写的大作中引用了王家骅先生的论文。这种精神令人感动。

关西大学陶德民教授，也是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的客座教授，应邀在百忙中寄来《纪念王家骅老师》一文，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使我们真切地了解到王家骅先生的研究成果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振聋发聩”的影响力。而且陶教授具有广阔的国际学术背景和视野，在文章中他也介绍了自己在美国学术界介绍评述包括王家骅先生研究成果在内的中国日本研究的情况。指出王家骅先生的日本儒学与中日儒学比较研究成果已经达到了可以“与世界接轨，而且开始并驾齐驱了”的水平。这对于我们而言，是多么巨大的鼓励和鞭策啊！

研讨会上发表的其他论文和纪念文字的作者，一些是亲炙王家骅先生教诲的学生（如韩立红、李卓、姜文清、聂长顺、郭丽、冯良珍、郝祥满），一些是王家骅先生学生的学生，如李卓老师的学生谭建川、许译兮，赵德宇老师的学生张博。或缅怀王家骅先生的人格和业绩，或总结和梳理南开日本研究者对王家骅先生开创的日本儒学研究传统的继承与创新，或从各自的领域论述与日本儒学或日本思想文化史相关的议题，内容都很充实，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研讨会的形式单纯而严谨，开幕式、主题讲演、研究发表、综合讨论、会议总结与闭幕，没有一句与学术无关的话。9点开始，李卓教授主持的开幕式上，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宋志勇院长和会议共同主办方《深圳大学学报》“文明对话与文化比较”专栏的责任编辑来小乔女士简短的致辞后，由我代读和说明三份特别寄稿，即鹿野政直先生的《追慕王家骅先生》、陶德民教授的《纪念王家骅老师》和姜文清教授的《汉俳六句，以寄追怀王家骅先生之思》。接着是赵德宇教授主持的第一场主题演讲（桂岛教授、辻本教授报告）和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王青研究员主持第二场主题演讲（徐兴庆教授、李卓教授、谭建川教授报告）。下午前半场为王家骅先生的学生及学生的学生作研究发表，后半场为综合讨论。综合讨论主要是王家骅先生的学生（除了上述发表论文的之外，还有赵德宇、孙雪梅）谈各自亲炙先生教诲的种种经历和真情实感，王先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作为种子深深埋在了学生的心中，并化作一种动力，影响到下一代。大家说到动情处，甚至有人哽

咽不断。这就叫耳濡目染、薪火相传吧。最后由徐兴庆教授进行会议总结、李卓教授致闭幕词。研讨会的日程非常紧凑，与会者都觉得这个纪念研讨会很圆满、很成功。

本次研讨会是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与《深圳大学学报》“文明对话与文化比较”专栏共同主办。其缘起是，2014年，时任《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的常务副主编王兴国教授来向我约稿，我投了一篇与学生周晓霞联名的《近代日本女性解放思想先驱的女权思想探析》，发表在同年第5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妇女研究》2015年第1期全文转载）。后来我试着与兴国学兄商议合作主办此次研讨会的事，兴国兄慨然应允，并答应到时可以从会议论文中选取两组论文在“文明对话与文化比较”专栏中刊出。但是没想到，到会议临近，我邀请兴国兄来参加会议的时候，他说自己已经不在原来的编辑岗位上了，不适合代表学报去参加会议，但是他告诉我不要担心，原来的约定会尽力促成，并介绍了“文明对话与文化比较”专栏的来小乔编辑来参加会议。会后两组稿子分别由我和赵德宇教授主持，如期刊登在2015年第6期（韩立红和我的两篇论文）和2016年第2期（桂岛宣弘、辻本雅史和张博的三篇论文）专栏上。我注意到第一组的专栏刊发时，兴国兄还是编辑委员之一，到第二组的专栏刊发时，已经在编辑委员会中找不到他的名字了。感谢兴国兄的提议与尽力促成，感谢来小乔编辑的认真工作，也要感谢《深圳大学学报》新的领导班子能够信守诺言。为了纪念这次合作，我将这五篇文章和两篇“主持人语”集在一起以“文明对话与文化比较”专栏的名义保存在这本书中。

会议结束后，8月份正好有机会再次访问早稻田大学。8月17日再次拜访鹿野先生，呈上会议资料集，详细汇报了研讨会的情况。鹿野先生也感到无限欣慰。言谈中鹿野先生提到与家永三郎先生的关系，并且随即拿出一本2014年出版的《家永三郎诞生100年——宪法·历史学·教科书审判》（“家永三郎诞生100周年纪念实行委员会”编辑、新日本评论社出版），该书的第一篇即是鹿野先生的《家永三郎的学问与历史认识》。鹿野先生说家永先生是自己的老师，据《家永三郎年谱》（《家永三郎集》第16卷），家永先生1952年4月到1957年3月为“早稻田大学第一文学部讲师（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日本史学）”，而鹿野先生是1953年毕业于早大文学部，之后继续深造，经过研究生阶段，1958年留校任教。就是说家永先生在早大任教时，正是鹿野先生本科的最后一年和整个研究生阶段。鹿野先生谈了很多家永先生作为教师、作为研究者、作为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的敬业、博学和热爱和平、

追求进步等优秀品质。我不揣冒昧、得寸进尺地提出请鹿野先生为将要出版的王家骅先生纪念专辑赐稿一篇，鹿野先生显然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我立即解释，已经发表过的论文当然也可以。但是，事出突然，鹿野先生还是没有轻易答应。9月9日，收到鹿野先生寄来的8月27日写的信和上述《家永三郎诞生100年——宪法·历史学·教科书审判》一书。鹿野先生在信中说：

当时您还提到为明年将刊行的纪念王家骅先生的论集寄稿的事，多谢您的好意。当时太突然，什么也想不起来。给您寄这本《家永三郎诞生100年》时，突然想到该书所收小论（第3—23页），如果能够用得上的话，我感到非常荣幸。

虽然不是王先生本来的儒学领域的文章，一时想起家永先生的藏书被南开大学接受。不知是否可以，如果认为可以的话，请告诉我，我向该书编者家永三郎先生诞生100周年纪念实行委员会申请许可转载此文。如果认为与编辑的宗旨不合，请不要放在心上。

第二天9月10日，正好是中国的教师节，我以学生的身份给鹿野先生去信致以节日祝贺，并写道：

收到《家永三郎诞生100年》，非常感谢。逐字逐句、非常认真地拜读了大作《家永三郎的学问与历史认识》。非常感佩于家永先生的人生态度和人格。作为一个历史学工作者应该如何生存，由先生的高论得到了很好的鼓励和启发。请一定让我们翻译出来刊登在论集上，以便广泛地嘉惠中国学界。

10月29日，鹿野先生来信说已经联系好了转载的事。众所周知，鹿野先生是岩波书店1997—1999年出版的《家永三郎集》（共16卷）的编者之一，对“家永史学”的真髓有独到而且深刻的理解。就在第二次访问鹿野先生的8月17日，我在网上订购了一套《家永三郎集》，收藏有家永先生藏书^①的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有学习和研究“家永史学”的责任，从这种意义上说，鹿野先生在家永先生诞辰100年之际写下的这篇《家永三郎的学问与历史认识》对于我们就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

无独有偶，我手头的这本王家骅先生的日文著作《中日儒学的比较》（六兴出版社，1988年）的腰封上正好印着家永三郎先生的一段短文，题目是《期待“东

^① 松永昌三：「家永三郎先生からうけた学恩と蔵書整理」、『日本歴史』第800号、2015年1月。

亚中的日本史”丛书的出版》，文曰：“……中国人是如何看待日本的历史的？对许多日本人而言几乎不知道。由中国的日本史研究者所著的这套丛书，可以了解从中国所见日本历史像是怎样的。这对于只是以日本人的眼光来看日本的历史的我们而言，无疑将会得到绝大的启发。因此期待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计划的完成。”这套丛书已经出版快三十年了，^①我们应该有新的系列成果来告慰家永先生、告慰中国的日本研究学术传统。

这本纪念专辑中还有两篇平石直昭先生的论文和一篇区建英教授的论文，对平石先生的大力协助和区教授的好意表示衷心感谢！

我和平石先生、区教授的交流源于丸山真男《日本的思想》一文的翻译，^②在平石先生的《中译本〈日本的思想〉序文》和我的《译后记》中，对此有详细记载。从那以后，我常常向平石先生请教，他也总是不厌其烦地有问必答。7月4日的纪念会议结束后，我从王家骅先生的遗物中发现了平石先生1988年7月25日给王家骅先生的信函。7月12日给平石先生去邮件报告会议的情况，并将信函扫描了寄上，同时表示希望8月份去拜访他。当天就收到了平石先生的回信。这封信勾起了平石先生的回忆，他在回信中说道：“1988年对我而言是记忆深刻的一年。此前一年写了《战中·战后徂徕论批判》，对丸山、吉川二人的徂徕论进行了彻底的探讨，在此基础上，这一年我在《思想》杂志上以《徂徕学的重构》为题发表了自己的徂徕论。这年秋季，在日本思想史学会的大会上，发表了新说。因此血气方刚，给王先生的书简中也像是很不客气地作了些批评。王先生想必是苦笑以对吧。”他并告诉我，现在他是东京女子大学丸山真男文库的顾问，定下来在图书馆见面，到时候可以参观文库。

2015年的8月，东京也非常炎热。这一个月对我而言虽然忙碌，却也非常有意义。8月26日11点，我按时到达东京女子大学（上次是15年前，我那时还在东京大学留学，即2000年的5月31日，我到这所学校听过福田欢一先生作“丸山真男及其时代”的讲演）。天在下着毛毛细雨，湿润的空气，好像要将校园里满眼

① 该丛书的编辑的缘起、意义等，参见王金林：《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与学会活动》，李玉主编：《新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30—232页；参见拙文：《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种粗线条的学术史漫谈》，《日本学刊》，2015年第2期，收入拙著《“中国式”日本研究的实像和虚像——重建中国日本研究相关学术传统的初步考察》。前者侧重介绍日本学者的积极评价，后者谈到日本学者的一些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批评意见。见拙著第138—140页。

② 丸山真男著：《日本的思想》，区建英、刘岳兵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的绿色融化。舒适，沁人心脾。平石先生到图书馆的入口来迎接，丸山真男文库在馆内的地下一层，分开架和闭架两部分。我放下书包，平石先生即陪我参观开架部分。在食堂里吃过中饭后，到办公室喝咖啡，与丸山真男纪念比较思想研究中心的两位年轻的工作人员交流。之后参观文库的闭架部分，这里有许多讲义录的原稿，丸山对上课非常重视，有很详细的讲义稿。只要我对什么资料或书籍感兴趣，平石先生都会详细地讲解其意义或来龙去脉，令我非常受益。他看到我的目光停留在松永昌三的《彝伦抄》上，就给我讲解其在江户时代思想史上的意义。还谈到他给王家骅先生的书信及其《徂徕学的重构》，他形容徂徕学的强大的冲击力时说，如果真正理解了徂徕学，人生观会发生变化的。他同意我们将此信函和论文翻译成中文登载在王家骅先生的纪念专辑上。第二天，平石先生来邮件还提到《彝伦抄》收录在日本思想大系的《藤原惺窝 林罗山》这一卷中，要我去早大的图书馆查一下。而且为了让我更好地理解学界对德川思想史的研究状况，平石先生还给我介绍了他的一项共同研究课题的成果报告《新的德川思想史像的可能性——以“近代化”和“日本化”的统一为目标》。9月15日，我收到了这份研究成果报告，读过之后觉得对理解战后日本学界对德川思想史的看法是如何变化的，非常有启发意义。我很想把它介绍给中国学界，与更多的关心日本思想文化的读书人分享，平石先生也同意我们将此文翻译发表在这本纪念专辑中。后来我请王起和张博分别将这篇报告和前面提到的《徂徕学的重构》翻译了出来。

区建英教授的论文，是她根据2015年12月22日在南开日本研究院讲演的内容整理修改而成的，收录在这里留作纪念。区教授2015年下半年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做客座教授，在百忙中抽空为我们作了精彩的讲演，在此深表感谢！

本书中还收录了几篇日本学者公开发表的对王家骅先生处女作，即日文著作《中日儒学的比较》的评论文章。如前所述，这本书是当时在日本六兴出版社出版的“东亚中的日本历史”丛书中的一册（第5卷）。该书1991年荣获天津市第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1991年4月20日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学术情报研究室编辑的《学术信息》（试第25期）上发表了王家骅先生撰写的获奖作品简介，这篇短文也可以视为王先生对该书的自我评价，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全文抄录如下：

《中日儒学的比较》(专著二等奖)

南开大学副教授 王家骅

该书是国内外第一部综述日本儒学的历史并对中、日两国儒学进行比较的学术性专著。该书在日本儒学史的分期、日本早期儒学、日本朱子学、阳明学、古学的特色等方面均提出了新见解。

该书认为日本儒学史可以分为四个时期:(1)早期儒学(日本的大和、飞鸟、奈良、平安时代)。(2)作为禅宗附庸的儒学(日本镰仓、室町时代)。(3)全盛期与日本化的儒学(日本江户时代)。(4)资本主义时代的儒学(明治维新前至今)。日本儒学是以中国儒学为原动力而逐步成长的,然而日本儒学并非中国儒学的简单翻版,而是经日本文化改造的变形物。通过比较日本早期儒学和中国原始儒学、汉唐经学,中日两国的朱子学、阳明学、考证学,认为日本儒学的特色是:①疏于抽象的世界观思考,②重视感觉经验的认识论,③富于感情色彩的伦理观,④有德者王思想逐渐淡化,⑤强调灵活应对现实,⑥与固有思想的融合。

该书还对中、日两国儒学的社会机能进行了比较,认为日本儒学的思想体系总的说来虽不利于日本现代化的发展,但在封建社会末期,日本儒学为适应资本主义萌芽业已滋生和西洋学问(“兰学”和“洋学”)传入的新形势,已从内部产生了近代思想的萌芽,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阳明学所具有的反体制性和行动性也对明治维新这一近代性变革发挥了先导作用,在明治维新前和战前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经改造的儒学道德观也为日本独特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如“团体主义”“家族共同体意识”)等提供了依据,即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日本儒学也曾发挥过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在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现代化过程中,日本儒学具有阻滞与推动现代化的二重性。

这段文字是对该书精华的高度概括,而且此后王先生的《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儒家思想与日本现代化》两本书的问题意识可以看作从这里出发的“自然归趋”。1994年5月5日发行的《南开周报》第504期“海外评价集锦”(作者:肖福堂)这个专栏中刊发过该书的如下四条评价:

日本思想史学会会长源了圆教授说:“王家骅先生的《中日儒学之比较》

一书是迄今还未曾尝试的壮举。”（《朝日周刊》，1988年8月5日）

东京大学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教授沟口雄三说：“该书是第一本叙述在日本从《古事记》时代到现代的接受与改造儒教状况的劳作，作者是日本史专家，其辛劳是大而多的。”（《周刊文春》，1988年7月号）

都留文科大学教授加藤实说：“本书从古代论及现代，充分发挥了作者以日本思想史为专门的才能。”（《东方》，1988年11月号）

东京大学的伊东贵之说：“由作者一人写成本书这样的通史，而且由本人用日语写成，可以说有很大的意义。作者博搜包括杂志刊载的论文在内的日本的研究成果，我以为其成果可以看成是当前中国的日本研究的里程碑。”（《历史学研究》，1990年6月号）

在编辑纪念会议资料集时，我将以上四篇日文评论文章原原本本复印收入其中了。这次成书，我们将其翻译成中文收录到本书中。一方面是为了作为完整的资料保存下来，另一方面，这些评论既有衷心的褒扬，也有善意的期待和中肯的批评。而只有认真接受和领会中肯的批评，学术研究才可能进步。如沟口雄三先生所提出的比较的标准问题，即只是以中国的儒教作为标准来推测日本的儒教接受程度，是否能够正确说明日本儒教的特性，中日儒学的不同究竟是结构性的不同还是机能性的差异，这些问题在今天依然值得探讨。王家骅先生后来对中日儒学史上“诚”“孝”概念的比较研究，可能直接就是受到沟口先生批评的影响。而源了圆先生的对该书第九章即“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儒学”这一章的批评，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里可以说几乎已经包含了王家骅先生的《儒家思想与日本的现代化》一书的基本思路。加藤实先生也提到该书在比较研究上方法论有简单化的倾向。而伊东贵之先生所提的问题更系统而具体，对此我已经在《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论及，^①就不再赘述了。结合王家骅先生的学术发展道路来研读这一组书评，可以更真切地感受到学者之间真诚的学术交流及虚心的态度对于深化研究工作是多么重要。

还要简单地介绍一下本书中的三篇“处女作”。前面两篇属于我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重大项目“近代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思想逻辑”（批准号

^① 参见拙著《“中国式”日本研究的实像与虚像——重建中国日本研究学术传统的初步考察》，第138—140页。

15JJD770015)的阶段性成果,作者费清波和唐小立都是南开日本研究院在学的二年级硕士研究生。我们一起在课堂上研读村冈典嗣的《神道史》的情形还历历在目,很高兴唐小立因此而选择了平田笃胤作为研究对象。费清波的选题,我也提供过一些参考意见。后来填写上述项目的申请表,她们二位也都是课题组成员。朱奇莹的文章也是她在日本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处女作,这篇文章基本上可以说是我给她的命题作文。在日本近现代思想史上,我一度对阿部次郎的人格主义非常感兴趣,而且几乎沉醉其中,因此,甚至曾经有研究近代日本文学的朋友向出版社推荐我翻译《三太郎日记》。可是等到出版社真的来联系了,我这里却因为种种缘故无法专注于此事,结果不了了之。后来遇到了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日语系教师朱奇莹,当时我觉得从悟性或气质上,她都适合研究阿部次郎这个人物。也可能是我对“三太郎”的“热情”感染了她,无论如何,不久她就交出了这样一篇“作业”,也一并收在这里。在纪念王家骅先生的文集中,以这种方式见证她们在学术道路上的起步与成长,我想王先生也不会有意见的吧。

王家骅先生的同辈学者、国内日本哲学、神道思想研究的开拓者王守华先生应邀寄来追忆文章,由此我们可以真切感受到那一代学人的艰苦与努力,他们从事学术研究的时代感与责任感,也都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记得纪念研讨会结束之后,我陪同与会者参观王家骅先生复印资料专架的情形,大家都非常感叹王先生的努力与执着。三百余种图书资料,每一册(为便于阅读同一种资料有的装订成数册)都整整齐齐地装订好,有封面封底。其认真仔细可见一斑。而且每一页都是王先生挑选过的,我相信上面还留存有王先生的目光、气息和余温。

纪念王家骅先生的学术会议,以扩展的形式编成这本纪念专辑,是否可以告慰王家骅先生的在天之灵?当然,纪念和研讨王家骅先生的人格和学问,实际上不仅仅是为了王先生个人、也不仅仅是王先生的家人和学生的个人行为。王家骅先生的以儒学为中心的日本思想文化史和中日思想文化比较与交流研究的业绩,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日本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也是中国日本研究学术传统中重要的精神资源;既是王家骅先生智慧、人格的结晶,也是那个时代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和中日学术交流在王家骅先生生命中的呈现。牟宗三曾说:“不是自己生命所在的地方,